



本期编辑:刘诗萌 美编:桂璐 校对:白艳红

靖边羊肉剁荞面

李晓钰



秦味

路过靖边,路边饭馆的招牌总带着股执拗的骄傲,“正宗羊肉剁荞面”七个字被阳光晒得发亮。掀帘而入,映入眼帘的常是师傅抡动两尺长的剁面刀,在案板上“笃笃笃”地敲出节奏,案板上的荞面团渐渐化作根根面条,混着后厨飘来的羊肉香,把毛乌素沙地干燥的风都染得温润了。这碗藏在陕北高原褶皱里的面,是靖边人用风沙和阳光写就的味觉诗,每一根面条都缠着土地的秘密。

靖边羊肉的鲜美,是刻在地理基因里的。羊群常年被投喂地椒草、沙葱,其肉质浸满草木的清香,连骨头缝都透着甘甜。靖边人深谙其道,烹饪只用清水慢炖这一“极致减法”,带骨羊肉剁块,投入些许花椒、两段红葱。大火烧开撇沫,转小火咕嘟三个小时。汤色渐成诱人的乳白色,筷子轻触,羊肉便从骨头上温柔滑落,入口即化,鲜味直抵心胃。

荞麦,是靖边人对贫瘠土地最深情的回应。它在黄沙与黄土的夹缝中扎根,结出饱满如黑珍珠的籽粒。新收的荞麦,经石碾脱壳,磨成粗细两种面粉。“七分细面,三分粗面”,是老师傅调和口感的不传之秘,如此制出的面条,筋骨十足,又带着荞麦特有的微苦回甘,像极了靖边人的性子,硬硬里藏着温柔。靖边人说,剁荞面的灵魂在“剁”字上,这也是靖边女子代代相传的生存秘诀。一把特制的剁面刀,长约二尺,刃薄如蝉翼,在巧妇手中化作乐器。提臂悬时间,刀落案板急如骤雨,面条如银丝飞舞,细若粉丝却韧劲十足。这不仅厨艺,更是力与美的交响。旧时靖边婚俗中,新妇过门首考便是剁荞面功夫,刀起面落的韵律见证了无数新娘的人生序章。

靖边当地人喜欢的信天游唱道:“荞面恰像羊膻汤,死死活活相跟上。”这不仅唱出了羊肉剁荞面这对黄金搭档的暖心浓味,更以美食比喻忠贞不渝的爱情。一碗合格的羊肉剁荞面,汤头是“定盘星”。除了厚醇的清炖羊肉汤,老辈人爱点睛一笔,加入“洋葱花”,既解羊肉腻感,又添山野清酸。更有讲究的人家,会撒一把风干羊肉碎,浓缩了阳光的味道,让鲜味瞬间翻倍。

在靖边,这碗面远非简单吃食。它是春耕地头保温桶里的力气源泉;是秋收后邻里围坐炕桌、大汗淋漓的欢聚盛宴;是大年初一清晨,寓意“长长久久”的开年第一餐。它浸透了生活的滋味,承载着土地的馈赠与人情的温暖。

如今的靖边,高楼渐起,但街头的剁面馆依然人声鼎沸。西装革履的年轻人裹着头巾的老人同坐一桌,人手一只粗瓷大碗,吸溜声此起彼伏。阳光穿过窗棂,照亮碗中荞麦面的暗金光泽,沉底的羊肉块如琥珀般温润。门外吹来的风,带着沙柳气息,与碗中香气缠绕。这碗面,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它是靖边人将风沙里的苦、阳光里的甜、土地里的韧,统统“剁”进了生活,熬成了日子该有的滚烫模样。

若你行至靖边,定要寻这碗面。当那“笃笃笃”的剁面声响起,你听见的,是黄土地深沉的脉动,是生存的智慧,更是靖边人把平凡日子过得百滋百味的那股子“不服输的倔强”!

蒲城:易俗社的文化抗战故事

权向丽 王东周

在蒲城县档案馆,泛黄的卷宗静静诉说着往昔岁月。

1944年,易俗社副社长刘淦写给蒲城籍民主人士李约祉的手札,连同他与蒲城县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财委会主任委员王仲度商定的《简条》、易俗社在蒲城演出的《露水》等珍贵档案,穿越战火硝烟,历经岁月洗礼留存至今,依然散发着历史的厚重气息。这些档案宛如一把把钥匙,开启了那段以秦腔为号角、以文化为战旗的抗战岁月,诉说着文艺工作者与民众携手同心、共卫山河的热血往事。

翻开《蒲城县志稿》,一幅特殊年代的悲壮图景徐徐展开:“(1943年)八月十九日,各界欢送第一次出国社丁四百名赴印度;十月三十日,送第二次出国社丁四百一十名赴印度;十一月二十五日,送第三次出国社丁三百二十名赴印度……”据统计,1943-1944年间,蒲城先后八次欢送近千名热血青年奔赴印度战场,投身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抗战最艰难的相持阶段,正面战场胶着对峙,敌后战场惨烈厮杀,每一个国民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1944年,时任蒲城县志馆馆长兼主修的李约祉,以曾任易俗社社长的便利,向时任易俗社副社长的富平人刘淦写信,诚挚邀请易俗社莅蒲公演,以慰劳即将远征的壮士。李约祉的这份手札具体内容现已无从知晓。但刘淦复信的手札,却能串联起他与李约祉这两位易俗社重要人物为抗战贡献力量的动人篇章。易俗社的慰劳演出,早已超越普通文艺活动的范畴,成为凝聚民族士气、传递抗战信念的特殊仪式。

手札中,刘淦以严谨而不乏率性的笔触,与李约祉商议易俗社莅蒲慰劳出国军人的演出事宜。他在信中对演出日子的斟酌,尽显对此次文化劳军活动的重视。信中写道:约之学兄大鉴:

奉书悉。慰劳出国军人固属义举,但吾社早与雷村、曹村约定,到流曲镇、苏坊为学校筹捐定演三日,美原为学校筹捐定演十日,已约定钱交社。今日(即十四日)奉到兄函,估计日数约在阳历本月卅后,方能进行参加。决不定他处戏,俟到苏坊崇德村时,再商定赴蒲公演。此复!敬祝 道安!

弟介夫顿首,十一月十四。
以上为刘淦手札内容。约之即李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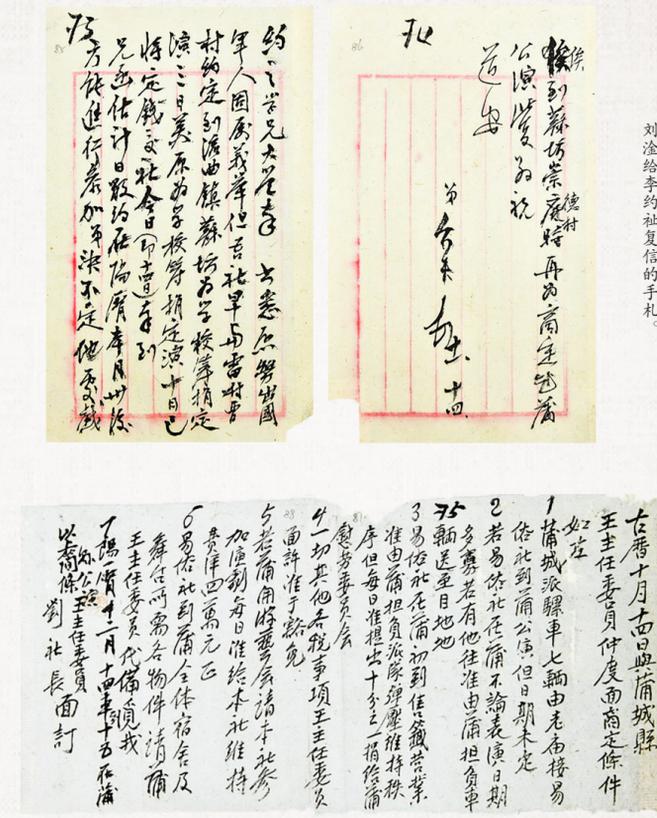
祉(1879-1969年),名博,别号金粟逸农,易俗社创始人李良材(字桐轩)长子,其弟李仪祉为著名水利学家。李约祉1906年加入同盟会,此后在革命、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曾任省视学及省立女子模范小学校长、女子模范中学校长,易俗社社长及评议长、教务主任、编辑主任,全国教育联合社陕西代表,蒲城县志馆馆长、县参议会议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与政协委员,著述及剧作甚丰。

刘淦(1874-1948年),字介夫,亦作介福,陕西富平人。早年任宝鸡、镇巴等县知事,1917年后投身社会教育事业,在易俗社任评议、副社长等职超20年。期间,他辅佐社长高培支处理诸多社内外事务,助力易俗社发展。1941年、1943年,他与编剧范紫东两次带队赴宁夏演出,备受当地民众欢迎,还多次率团在省内外各市县巡回表演。他生活简朴,关怀演员,自学中医为演员治病,深受拥戴,为振兴秦腔、培育戏曲新秀贡献诸多心血。

李约祉作为蒲城籍社会贤达,又数度在易俗社身兼数职,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使得他成为此次活动的关键联络人。刘淦在信中与他频繁沟通,足见对其能力与人品的认可与倚重。李约祉曾创作诸多剧本,如《韩宝英》《优孟衣冠》等等这些作品皆为易俗社当时演出的常选剧目。手札中虽未阐述剧目选定过程,但字里行间能感受到二人对于剧目选择的谨慎——既要契合抗战的时代主题,又要符合当地民众与战士的欣赏口味,以达到最佳的精神激励效果。

这封手札,不仅是演出安排的工作通讯,更是文化抗战的生动注脚。刘淦凭借在易俗社多年积累的管理经验与组织能力,在社内统筹协调,确保演出团队以最佳状态奔赴蒲城;李约祉则利用其在蒲城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号召力,为演出顺利落地提供坚实保障。他们以秦腔为媒介,让秦腔那激昂的旋律成为鼓舞士气的战歌,在蒲城大地上凝聚起军民同仇敌忾、共御外敌的强大精神力量。这封手札,见证了他们在特殊历史时期为抗战胜利所付出的心血,也为后人研究抗战时期文艺团体的爱国担当与文化抗战的独特意义,提供了珍贵而翔实的一手资料。

可以想象:易俗社莅蒲演出的那段日子,当带着满腔热忱和精湛技艺的演



刘淦给李约祉复信的手札。

《简条》。

员以苍凉豪迈的唱腔唱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壮,当舞台上演绎出保家卫国的英勇故事,台下的战士与百姓热泪盈眶。他们的眼神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心中燃起熊熊的爱国之火。这不是简单的艺术欣赏,而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精神动员。秦腔的粗犷豪放,唤醒了秦人骨子里的血性,易俗社的剧目内涵,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紧密相连。战士从戏曲中汲取力量,带着父老乡亲的期许踏上战场;民众在戏曲中坚定信念,以顽强不屈的姿态支持抗战。演员的表演,如同冬日里的暖阳,温暖了每个人的心田;如同战鼓,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

易俗社莅蒲慰劳演出,是抗战文化战线的生动缩影。在物资匮乏、战火纷飞的岁月,文艺工作者以戏曲为武器,用

文化的力量构筑起抵御外侮的精神长城。他们的努力,让抗战不仅是军事与经济的较量,更成为一场关乎民族文化传承与精神存续的伟大斗争。这种文化抗战的力量,看似无形,却深深植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成为支撑中华民族熬过漫长黑夜的精神火种。易俗社与蒲城商定双方合作细节、演出安排等事宜的《简条》,则体现了这次慰劳演出的严谨与周全;易俗社在蒲城演出的《露水》,则是这次慰劳演出盛况的生动记录。

如今,当我们再次凝视这些尘封的抗战档案,它们依然在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它们见证了文艺工作者的爱国担当,诉说着文艺救国的不朽传奇,更激励着后人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中,传承文化自信的力量,奏响时代发展的强音。

永寿吕公惠民渠——咸阳历史上最早的自来水工程

郭旭晔 王昕

谁与同,昔有吕公今那公。”由于泉水离城较远,“建渠而下,则趋润,迤邐渠之,乃得人郭,甚不易也。故糜渠而糜度。”到元至大二年(1309),永寿人白用又自觉地肩负起守护惠民渠的责任。有一天,他又一次出城找水,步行来到城北五里许,看到一股泉水向南流,十分高兴,带头捐钱,号召大家重新修渠引水。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瓦沟引流,直达城内,民利赖之。”据说,白用以“瓦沟引流”之法,用民间烧制的瓦罐去底后套在一起连成管道,将泉水引入县城的。至今在永寿县民间,把这个渠所在的沟还叫作“罐罐沟”。

清康熙七年(1668),举人出身的南昌人张焜被授为永寿县知县。他到任后,看到永寿城池破败,百姓困苦之景,决心改变现状。他不仅立即带领仆从返回家乡筹集了3000多两白银,回到永寿主持修建了新的永寿县城,而且对惠民渠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复。据清光绪《永寿县志》记载,张焜常常叹息说:“民之苦恒在饥,今永民又兼苦渴耶,日思所以济之。”他听说宋时,永寿修有吕公泉,“特患无觅之者”。于是带领县尉傅斌、教谕任名世和永寿贡生赵云熙踏山寻泉找水之路,终于在离县城八里处,临近分水岭麓的地方,“随云掘之,渐有清液渗出,再深掘之则汩汩然矣。”逾数十丈,掘之,水溢。又逾数十丈掘之,水又溢。”终于找到了三处甘香甜美的泉

水。第二天,张焜带头捐出自己的俸禄,招募民夫,把三泉汇于一处,因势利导,开麓成渠。在修渠的过程中,他指导修渠人员削平高处,填平低处,有山岭的,凿洞通之,有深崖的,削木渡之,逶迤曲折,引水入城。在城内砌筑成两个蓄水池,一个用于人饮,一个用于畜用,又一次成功解决了永寿县城人畜饮水问题。可是时间不长,就有永寿百姓找到张知县说,渠是土渠,水有渗漏,真正流到城里的水不多。有的还说,如果到了冬季天寒地冻,渠水结冰了,流不到城里,怎么办?如果平时没有人进行整修疏通,渠水淤滞了,又怎么办?张焜听到大家的意见后,深入百姓当中征求对策,并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水不就土则不渗,水不见风则不凝。”于是命令陶人制作瓦筒数千,顺水连接,覆以厚土,其断崖处将斩木换为石砌,并招募两名民夫,不时地进行整修疏通,做到了泉水涓滴不漏,严寒不凝,四时不倾泻之患。据清光绪《永寿县志》记载,张焜此举使惠民渠“涸废数百年,一旦复之。是岁田谷双穗,至有六穗八穗者。”这虽然有些夸张,但张知县修渠引水给永寿县百姓生产生活带来实惠那是肯定的,而称惠民渠为咸阳历史上最早的自来水工程也不为过。再后来,惠民渠由于地震被压塌了,渠道不太通畅。到清雍正十年(1732),乾州知州王以观和永寿知县黄

中铨对惠民渠进行了维修。乾隆四十一年(1776),永寿知县郑居中又对惠民渠做了一次大的修复,并在泉旁开凿了一口一丈多深的井,便于平时蓄水,并给井起名“承流井”,将惠民渠更名为“余泽渠”。清代以后,虽无明确史料记载惠民渠渠的后续状况,但可以推测,泉眼或许依旧潺潺流淌,保持着自然的韵律,而承载无数历史记忆的惠民渠,逐渐湮没在岁月的尘埃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饮水困难地区人民的吃水问题,在全国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永寿县境内的许多沟岔都相继建起了规模不同的水坝,利用水泵的扬程,有效解决了人们的饮水困难。改革开放以后,各级党委和政府以解决饮水困难地区人民人畜饮水困难为重点,组织实施了一大批规模较大的供水工程,永寿县村村有了辐射井,建起了高水塔,家家户户接上了自来水管,吃上了干净甜美的自来水,彻底告别了靠天吃水或没水可吃的历史。

从北宋吕公泉渠的开凿,到当代水利设施的大规模建设,永寿县一脉相承、接续为民修渠引水的变迁史,既是一部与自然抗争、谋求生存发展的奋斗史,也是一部凝聚着历代先贤智慧与汗水的民生史。那些湮灭的水渠、流传的故事、变迁的水利工程,共同勾勒出永寿独特的历史文化脉络,也为未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